一样拼起来， 拆卸了以后携带比较方便。“在古代，匠工在宫外做好，再给宫里送去，拆装之后，零件好携带，进宫只需要组装好就可以使用。”李振忠解释。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手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村民收入，古北口村请来京城著名的灯彩艺人——“灯笼张”张明亮为村民培训宫灯、走马灯、金鱼灯、吊脚灯等传统灯笼的制作方法。  
　　历经上百年的传承，再加上名师指点，村民们的手艺越来越好，宫灯的花样越来越多。2008年，古北口村把灯笼确定为“一村一品”重点发展产业，成立了御道宫灯厂，在生产大红灯笼的同时，也为四合院装修、展览等制作宫灯。“当年御道宫灯厂生产宫灯和大红灯笼6万个，销售综合收入180万元，带动村民就业60人，从业人员年均增收8600元，不仅解决村内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达到‘兴一业，富一村’目标，带动了全村经济发展。”古北口村党支部书记宋立滨介绍。  
　　如今，古北口村的御道宫灯驰名中外，古北口村格外看中这门手艺的传承。在古北口村，游客不仅能够看宫灯赏宫灯、了解宫灯文化，更可以学习灯笼制作方法，亲身体验做宫灯，顺便带个灯笼回家。  
　　小贴士  
　　怎么去：自驾车走京承高速，太师屯出口下高速，走101国道直接到达古北口村。  
　　  
　　【仙居手工制灯笼】  
　　大红灯笼照新年  
　　方  敏  张光剑  
　　年关临近，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湫山乡雅溪村里异常忙碌。这里是有名的灯笼加工村，全村178户，基本家家户户都会做灯笼。这几日，一个个喜庆无比的红灯笼从这里发往全国，甚至漂洋过海，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节日气氛。  
　　雅溪村人多地少，以往人们尽管勤劳，但仍难富起来。近几年，雅溪村找到了新路子——大力发展灯笼产业，自创灯笼品牌。“路对不嫌远”，全村2/3的村民从事灯笼加工，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以及东南亚市场，2017年灯笼产值达8500万元。  
　　制灯笼的老师傅介绍：红色象征着幸福、光明、活力，圆形与中国古代钱“元”的发音相同，代表圆满与富贵，其上下部分多饰以金纸剪制的如意圈纹，底端点缀金色丝线流苏。它是良辰喜庆之时必不可少的装饰灯品，点亮时通体透红，显得喜气洋洋、暖意融融，象征着阖家团圆、事业兴旺、红红火火。  
　　雅溪村生产的灯笼还和别处不一样。俞河星是村里一处灯笼加工点的老板。他说，大红灯笼传统做法包含20多道工序。而这里将传统灯笼各部分零件在结构和材料上加以改进，省去了不必要的工序，节约成本，减少工时，还使样式新颖多样。  
　　俞河星做的灯笼，自上到下主要分灯环、两根灯簧、上下灯盘、别棍、布面、灯穗8部分，要经穿钢丝、裁布、印花、缝布、绕绳、套灯、拉金条、晒灯等步骤。  
　　“灯盘采用注塑造型，大小统一，轻便实用。”俞河星说，竹条全部由铁丝代替，在两头各弯两根铁丝插到灯盘周围的小孔内。灯簧支高点设计的机关巧用折叠伞的伞杆撑子，让支收都更方便。  
　　现在，雅溪村还将灯笼的工序分工，流水线作业，一人负责一道工序。45岁的刘小苹做灯笼有5年了，一直坚守在套灯的工序。“套灯一定要把布撑紧，钢丝撑均匀，这样做出来的灯笼才美观耐用。”她说。  
　　为适应各类场合的需要，雅溪灯笼的制作户选用多种布料进行加工，如金丝绒、八美缎等。灯面的图案制作方法则更加精致多样，有的丝网印制，有的用金线手工缝制。  
　　“我们年年都会根据市场需求重新设计灯笼的字样。”俞河星说，做灯笼最担心的就是天气，做完拉金条后，得把粘金条的胶水晾干才能包装，要是下雨的话几天才能阴干。  
　　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就接触、了解灯笼。岁末，白雪皑皑的雅溪村，处处挂着大红灯笼，人们忍不住夸赞一句：年味都快要从灯笼里溢出来喽！  
　　小贴士  
　　怎么去：从台州市区出发，沿台金高速、三五省道方向行驶130公里，约2小时即到达湫山乡雅溪村。  
　　民族品牌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在美术领域，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体现，除了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有赖于艺术机构的助推。比如，在中国传统书画领域，一些集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修复、拍卖典当、出版印刷、展览展示、教育培训、进出口贸易等于一体的老字号，便是书画家创作、交流、展览、市场等方面的强大后盾。在西方画廊业入驻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将目光转向依托于民族文化的民族品牌和传统画店形态的现代转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刊特推出“民族品牌强国路”系列，聚焦美术领域中民族品牌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发展，希望民族品牌做大做强。  
　　——编  者    
　　  
　　在近百年的世纪风云里，作为老字号的荣宝斋，以全方位的文化经营享誉四方，更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影响深远。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它伴随着一大批书画大家的成长。从挂单鬻画到作品的流布，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李可染、黄胄、吴冠中等响亮的名字与荣宝斋相互映照，蔚成20世纪中国艺坛上一道明丽的风景线。还有那些镌刻在时光中的故事与传奇，更成为美术史上的佳话。这些积淀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老一代荣宝人眼中，从来都被视作最为宝贵的人文遗产，并且成为一种精神气度、格局与器量，传承在今天的荣宝人中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荣宝斋的品牌文化，正是以生意里的文化传承、民族情怀与工匠精神、人文视野与审美品质为基本线索与脉络的。正缘于文化的荫泽，以及经营策略的调整，诸多因素的遇合使得荣宝斋在新时代的曙光中，迎来一个跨越式发展期。  
　　生意里的文化传承  
　　公元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北京城南琉璃厂一家名为“松竹斋”的南纸店开张营业。因其所售商品均质量上乘，其后又承办官卷官折而名声大噪，生意逐渐兴隆。1894年，松竹斋设分号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美意。此后的300多年里，伴随着时代的兴替、历史的潮汐，以及琉璃厂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荣宝斋的招牌一直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以后，荣宝斋融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但其依然葆有过去的生意传统。比如，在荣宝人的心中，始终恪守着“诚信”信念，这不仅是一种传承有序的企业精神，更是荣宝人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一种经营品质。它一如“家风”，任时空流转，“忠厚”的品格始终流淌在家族每个人的血液里，进而升华为一种人格操守。也可以说，荣宝斋的“家风”，正是紧紧围绕着信誉展开的。用“光荣与梦想”去照亮，以“信誉与肩荷”去躬行。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切在荣宝斋的经营历史上体现得尤为清晰。  
　　“荣堂画艺贤人慧笔，宝店书风礼士清怀”，这是荣宝斋众多楹联中的一副。它道出这个百年老店的气格与风标。也的确如联语中所说的那样，荣宝斋的历史几乎贯穿着与绝大部分中国近现代著名文化艺术大师的交往史。它不但是荣宝斋历史上的佳话，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美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段文心郁郁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荣宝斋，更有“书画家之家”的美誉。齐白石、王雪涛、傅抱石、赵朴初、启功等众多书画艺术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创作、会客、休憩甚至居住。郭沫若、邓拓、肖劲光、张爱萍、肖华、傅钟、老舍、周扬、夏衍、齐燕铭、田家英等政界、军界、文化界高层人士，也经常光顾于此。傅抱石在京开会，除去参加一些推辞不掉的活动之外，更多时候是在荣宝斋观摩历代名家书画作品。晚上，他常常与同行边饮酒边聊天。在他心里，荣宝斋是他最开心的地方。也正如启功先生对荣宝斋的评价：“书画篆刻作品荟萃之区，诸名家聚首谈艺之所。”  
　　一边做生意，一边交朋友，一边传承文化，经营、交友、文事皆不误，这就是荣宝斋百年的生意经。  
　　民族情怀与工匠精神  
　　作为百年老字号，荣宝斋一脉传承的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手艺与工匠精神。  
　　1896年，荣宝斋增设“帖套作”机构印制笺纸，笺纸用雕版刻印，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清新、淡雅。进入20世纪30年代，笺纸的颓败之势日渐显现，旧有的店铺已经不再印刷，技艺高超的技师又相继离世。此际，一向对版画情有独钟的鲁迅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开始与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商议，在京城寻找能够印制精美诗笺的地方。最终，在荣宝斋技工的帮助下，两位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这一民族遗产得以传世。鲁迅曾经盛赞荣宝斋为“诸笺肆之白眉”。因此，荣宝斋又重新聚集了木版水印的技术力量，从刻印信笺逐步发展到印制大尺幅的设色中国画。而如今，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艺坊的师傅们，不仅传承着前辈的手艺与精神，同时更有一些创造与发明。他们中间，有的祖父、父亲就在此工作，可谓是过去手艺传承中的“世不替业”。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中青春老去，却带给人们一件件“下真迹一等”的佳构名作。而他们在劳作中所表达的信念和态度，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之所在。  
　　1953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黄永玉先生，受代理院长江丰委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套印（现称木版水印）技艺，为在美院版画科开专业课做准备。他以“小学生”的谦逊，拜专业人员为师，认真学习了两个多月，完成了被他戏称为“毕业论文”的《齐白石像》和《阿诗玛》插图。晚年的他曾回忆说：“两个多月来跟不少人工作上的亲近，成为终生幸福的纪念，几十年为动荡打断，又接续又被打断……这一代又一代友谊的联系，成为了一张让人生赞美的文化情网。”  
　　荣宝斋的装裱修复也是享誉四方。人民大会堂的巨幅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装裱，唐代绢本《女娲图》、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等重要文物的修复等，都是出自荣宝斋师傅之手。  
　　工匠精神，其实是一种技术的精神，是对“精微”的礼赞。中国文化里所谓的“技进乎道”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这种务实、敬业、专注、精益的精神，正是荣宝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文视野与审美品质  
　　在民间，荣宝斋素有“国家画廊”“民间故宫”的美誉。荣宝斋一方面是书画艺术品的经营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藏机构。历任荣宝斋的经理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精于鉴赏的行家里手。买卖中的过眼，生意上的洽谈，使他们练就了一双辨识真赝的火眼金睛。这也是荣宝斋值得骄傲和让人信服的人文资源。而且，在经营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优良传统。  
　　1963年4月，荣宝斋一次性收购37件历代书画珍品，其中宋元作品就达8件之多，且多为精品和孤本，包括国家级文物米芾代表作《苕溪诗卷》。之后，这些作品都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半个世纪中，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艺术珍品数千件，尤其以书画最为丰富。如元代的吴镇、盛懋，明清的沈周、文徵明、徐渭、仇英、董其昌、王铎、陈洪绶、“四王”、龚贤、朱耷、石涛、“扬州八怪”、虚谷、任伯年，近代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家的书画精品。此外，还有明代程君房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纸，尤其是重达4275克的田黄石等稀世珍品。这些都体现了老一辈荣宝人前瞻的视野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同时也是荣宝斋留给社会和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除了收藏之外，画廊的经营也是荣宝斋的重心所在。从近现代到当代，荣宝斋画廊均有相应的部门分工。尤其是对当代书画家的遴选，荣宝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操守，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在此基础上为书画家提供一流服务。  
　　荣宝斋崇尚冲和大雅，黜除炎闹俗态，关注性灵涵养与精神上的旷达与超越。尤其在作品上，它反对那种过分强调视觉冲击而忽略内在品质追求，摒除那种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这一切，也恰恰是百年荣宝斋所传承下来的重要审美品质和价值体系，是荣宝斋文化的点睛之处。  
　　作为国内画廊业的“国家队”，荣宝斋的情怀、视野与审美品质至关重要。尤其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层面，民族品牌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有鉴于此，荣宝斋美术馆内常年设置馆藏展，向全社会义务开放，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更有如“荣宝斋中国画双年展·2016”“世纪的背影——荣宝斋藏近代京派绘画展”“墨鸳鸯——荣宝斋藏近现代名家楹联作品展”“岭上云——荣宝斋当代篆刻名家邀请展”“东风引——荣宝斋当代名家书法邀请展”“世纪丹青——吴昌硕·齐白石绘画展”这样纯学术性的展事和讲座，推动着荣宝人一直倡导的艺术生活化的理想进程，这是荣宝人前行的动力，也是荣宝人从未动摇过的初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以及“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新要求。于此，荣宝人信心满满、干劲倍增。  
　　发潜德之幽光，继先贤之遗范。  
　　深耕文化，不忘初心。  
　　这是荣宝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对于荣宝斋而言，这更是一种人文的视野、使命与担当。  
　　近些年，每当春节临近，各地书协皆会组织广大书法家走进乡镇、部队、社区、厂企，举行“送万福进万家”等志愿服务公益活动，通过送“福”字、写春联，为社会各界献上艺术馨香、送上新年美好祝愿，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在“送欢乐、下基层”等文化惠民品牌项目已成为常规迎春活动的当下，从社会效益来看，这项坚持十余年红火的“老活”，在某些方面多少已呈现疲软状态。如何使这项惠民举措进一步焕发活力，已成为当前各界书协着重思考的问题。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联是中国人过新年的重要习俗，绵延千年有余。春联，既讲究文辞的对仗工整、简洁精巧之美，又重文辞所抒发的美好形象和美好愿望之寓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无数文人墨客曾留下无数耳熟能详、经久传诵的妙联。时至今日，虽然春联的生产方式有所改变，但国人对春联的喜爱如旧。当下，在各界书法家的积极参与下，“带副春联回家过年”，已成为文化惠民举措促成的群众期盼——书法家创作的春联，与机械印刷春联意义、价值大不同。既承延春联文化，又让群众领略书法之美，这类文化惠民举措无疑一举两得。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容易在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中走向平庸。随着各类文化惠民活动的持续推进，由于缺乏形式创新、传播方式创新、受众人群分析等原因，与送“福”字、写春联相关的此类惠民活动很容易落入“一写一赠”的套路，仅仅表现了书写春联的形式，忽略了春联背后所蕴含的深厚人文底蕴，文化惠民的实际作用得不到发挥——受赠群众更多关注作品的市场价值，忽视书法的艺术价值，以及春联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因此，很多人收到春联也不问所以，或将其带回家贴在门上图个喜庆；或将其当做名家之作收藏起来。有的人甚至上下联分不清楚，春联贴反了的情况并不少见。其结果是创作者与受赠者、受赠者与文化之间依然是一种断裂的存在，文化未能通过春联这道媒介起到真正惠民之作用。长此以往，送“福”字、写春联很容易成为一种意义枯燥的“狂欢”。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文化系统、文联系统一些组织者已经认识到此类活动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思考如何从内到外、从形式到内容将文化惠民落到实处。其中，上海市文联、普陀区委宣传部主办的“2018上海春联大会”对此做出探索，令人耳目一新，近期登上众多纸媒头条，予人思考。  
　　“老活新做”新在观念。为跳出形式单调的窠臼，扩大活动的文化传播力，“2018上海春联大会”借鉴近年来引发社会关注热潮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传统文化传播新方式，将春联文化与书法文化以节目形式有机融合在一起，运用跨界思维、新媒体手段，通过做加法，如“书法+音乐”“书法+剧场”，使活动产生很多新奇的“通感”，给受众带来不同的体验。同时，“2018上海春联大会”融合了征联、学联、写联、送联以及多台演出节目，并通过网络等进行全程直播，使这项活动通过文化汇演，深入阐释春联的文化内涵以及书法艺术之美。  
　　“老活新做”新在策划。为将创作者与受赠者连接起来，活动一手牵住书坛“大咖”，一手牵住大众，既避免落入俗套，又拒绝有阳春白雪的距离感。一方面，春联大会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凸显对文化、对艺术创造的尊重。与以往书法家小规模散点式走街串巷送春联不同，“2018上海春联大会”选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百位书法家身着红色唐装，一同提笔挥毫，书写春联，营造出浓浓的仪式感。同时，活动方集合现场700余位观众一同观看，在全场观众及网络在线观众的共同见证下，一起感受独特的书法艺术如何与独特的春联文化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活动方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受赠群体，并强化其参与度——除了到场观众和工作人员皆能领到一副由上海书法名家书写的春联，书法家着重向劳模代表、外国友人、来沪务工者等群体代表，赠送装裱精美的春联卷轴。同时，老书家与小书家互赠“福”字、外国友人在小书家的指导下书写“福”字等环节的加入，既强化了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又在继承传统人文精神的同时很好地凸显书法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特点。整场活动可谓高潮迭起，充满浓郁的中国风。  
　　“老活新做”新在内容。为使春联文化真正成为全民文化，“2018上海春联大会”还推出了“前传”——“戊戌贺春”海内外春联大征集活动，很好弥补了写联与读联脱节的问题。征联活动针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国外参赛选手，共收到海内外稿件五千余件。获奖作品围绕辞旧迎新，把握新春气息，以新颖的创意，体现新时代精神和民俗特色，充分展示了人民生活风貌。同时，为了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春联文化，喜爱书法艺术，活动还特别设置了竞赛环节，上海3所中学代表队现场比拼春联知识，积极传承传统艺术和民俗中的民族文化基因。  
　　任何一项文化活动，其意义都在于充分发挥其文化和社会价值，泽润大众的心田。这要求文化工作者、组织者不能固步自封、落于窠臼，在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中增强活动的文化传播力，放大其文化意义，使传统节俗文化在今天真正开启新价值、新风尚。  
　　2018年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强调，要扎实推进人文交流，推进各领域长效合作和机制建设。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期开幕的“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可谓是深化中法文化交流的有益尝试——展览聚焦的学院派和新古典主义，不仅影响整个欧洲，也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个展览是自马克龙访华后，中法两国文博界第一次交流与合作，全面开启了两国艺术界合作与交流的新篇章。中法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着深厚的渊源。众所周知，发轫于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中法文化艺术的交流更是源远流长。习近平同志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在此重温法国艺术巨匠精品，回顾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对未来中法文化交流的美好前景充满期待。  
　　一件事情要取得成功，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三重因素。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的形成，有时候也是如此。“学院与沙龙”展用103件学院派艺术珍品，向观众展示了18、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学院派和新古典主义艺术兴起的背景与发展历程。参展作品中有大量名家名作，而且包含精巧的构思：从宏观角度清晰还原社会背景、学术机制以及大师成就三方面作用下，艺术流派是怎样被塑造的。  
　　天时，就是学院派和新古典主义兴起的大气候，包括时代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新的文艺思潮等，是艺术风格成形时所处的大环境。19世纪的法国，在启蒙运动指引下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次展出的艺术作品，创作时期涵盖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伴随着改革和进取。  
　　政治的变革召唤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人们的审美也在此时有所转变。“新古典主义”庄重、理性、充满英雄主义理想的风格，与启蒙精神有着共通的底色，更符合当时社会需要，替代了当时服务于皇室、气质奢华的洛可可风格。新古典主义艺术在主题和风格上都强调模仿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经典，意在用古典的英雄故事和其中蕴含的深沉情怀来教育和感化现世的人，用古希腊和罗马的诗歌、故事、寓言来阐述道德规范。  
　　1748年庞贝古城遗址的发掘，使得公元一世纪被火山灰掩埋的许多古代文物重见天日。这在欧洲引起很大轰动，掀起欣赏和学习古典艺术的热潮。“新古典主义”就是在重新发掘、重新认识“古典”的热潮中产生的。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就采用“庞贝红”作为墙面颜色，来表现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时代背景，用火热的色彩衬托出一件件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  
　　艺术学院的兴起与时代的大气候相辅相成，为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在欧洲众多学院中，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其中的翘楚，成为欧洲其他美术学院学习的楷模。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学院体系创作并推广的艺术作品流派，也被称为“学院派”。由于新古典主义是学院派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大多数学者把学院派与新古典主义等同起来，两个概念经常同义置换。  
　　本次展出的103件作品中，有64件来自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足见学院土壤对艺术创作之花的培植收效显著。展览的第一部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美的圣殿”，系统展示了该学院的教学成果。这部分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学院的培养”，展示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教学体制上的突出成就。第二个主题“透过罗马大奖看历史题材绘画及雕刻作品”和第三个主题“为获得罗马大奖做准备”，都反映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创始的美术竞赛体制对艺术创作起到的导向性作用。很多著名艺术家在学生时代都是罗马大奖的获得者，他们的获奖作品都在这一部分展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安格尔于1801年获得罗马绘画奖的《阿喀琉斯接见阿伽门农使者》，这幅作品能够来中国展出，弥足珍贵。  
　　学院举办的沙龙展，也为18、19世纪法国艺术的繁荣做出很大贡献。1737年起，学院每年在卢浮宫的“方形沙龙”大厅举办“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沙龙展”，简称“沙龙展”。沙龙体制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欣赏者和赞助者，使艺术界更活跃、多元，也形成新的艺术取向，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展览中观众将欣赏到在沙龙中获得声誉的重要作品，包括安格尔的《朱庇特与忒提斯》、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像》、卡米耶·柯罗的《意大利风光》，还有帕斯卡·达仰—布弗莱的《应征入伍者》（见图）和其他一些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得以保存，得益于国家通过征订、购买沙龙展作品给予艺术家们的鼓励。购买和征订的作品收藏于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  
　　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艺术大师们的光芒，他们是时代艺术的弄潮儿。学院派艺术发展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就是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安格尔作为最后一位新古典主义大师，继承了新古典主义的衣钵，同时也是学院体制的捍卫者。本次展览中“美院的安格尔时代”这个小节特别展示了他的卓越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展品是高3.27米的巨作《朱庇特与忒提斯》，这是安格尔的代表作，之前从未在欧洲以外展出，是法国国宝级艺术珍品。  
　　安格尔曾说：“素描者，艺之操也。” 他认为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注重形体和结构的艺术标准在学院体制中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句话对于后来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的艺术家徐悲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徐悲鸿一直以素描为教学的基础，并影响了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学院教学体系。展览把他的这句名言刻在墙上，体现出这位大师如何奏响时代的强音，奠定了艺术领域新乐章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之后，安格尔等欧洲古典大师的作品，特别是其丰富的绘画语言和娴熟的技法，也影响了靳尚谊、杨飞云、王沂东等一代油画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写实主义油画，或称之为中国的“新古典主义油画”。凡此种种，皆是学院派和新古典主义在中国艺术中的余音回响。  
　　艺术展览，特别是群展，不仅反映艺术本身，更以宏观的视角，反映艺术背后更深沉的文化内涵。希望本次展览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明的艺术音符，更是一整首时代的交响乐，在观众心中留下整个19世纪法国艺术脉络完整而深刻的印象，留下中法两国艺术交流的历史轨迹，由此细细品味其在中国的回响，思考新时代中国艺术的走向。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1日发布消息，随着2月11日上午青海省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产生，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已全部按照法